

福建文化的地域考察

文化的地理

Wenhua de dili guo cheng fen xi

过程分析

林 拓 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福建
文化
的
也
或
生
考察

文化的地理 过程分析

林 拓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林拓
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

ISBN 7-80678-134-X

I.文... II.林... III.文化史-研究-福建省
IV.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360 号

特约编辑：刘 影

责任编辑：郑力民

封面设计：程 钢

技术编辑：毛志明

文化的地理过程分析 ——福建文化的地域性考察

林 拓 著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上海展望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13.375 字数 372 千

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ISBN 7-80678-134-X/K·27

定价：24.00 元

目 录

绪 论	1
一、学术史回顾与课题任务的提出	2
二、文化地域性一般探讨模式的若干问题	8
三、课题研究整体构想的形成与确立	12

上篇 地域层级与文化中心

——以学术形态为核心展开的研究

引 子	19
第一章 从化外之地到两个文化带的相继发育	24
第一节 两汉至六朝时外地文人入闽	
——兼评福建文化闽江流域策源地的传统观点	24
第二节 地域格局多元化的早期雏形	30
一、隋至唐前期沿海地区的稀疏分布	30
二、中晚唐士风的转变与沿海文化带的初步发育	34
三、唐末五代时地域格局雏形的呈现	39
第二章 两宋时期地域格局的多元发展态势	47
第一节 教育的地域扩展与科举反映的区域梯度	48
第二节 文化中心多元化的发展格局	65
一、中心地带之一：建溪一线及浦城、邵武等地	66

二、中心地带之二：莆田、福清等地·····	74
三、中心地带之三：晋江等地·····	77
四、中心地带之四：闽县、侯官一带·····	80
第三章 元代文化地域格局的过渡性变化·····	85
第一节 科举中挫与教育发展所形成的地域差异·····	85
第二节 高潮回落与学术发展所形成的地域格局·····	93
第四章 明清时期文化层级中心的确立及其地域格局·····	108
第一节 福建文教地域层级的形成及其作用	
——兼论地方行政与区域经济的双重规整·····	109
一、学校教育的地域体系化进程及其发展悖论·····	109
二、书院的双重布局与书院文化中心的确立·····	116
第二节 区域中心的演变与省级中心的逐步确立·····	124
一、区域文化中心的形成、变迁及其特色·····	124
二、福州：省级文化中心的最终确立及其影响·····	143
第五章 个案研究：从刻书业的地域变迁看福建文化格局的 演变过程·····	154
第一节 以刻书业为案例的合理性分析·····	154
第二节 多元格局时期刻书业的广泛分布及其中心的变迁 ·····	156
第三节 过渡格局时期刻书业滑坡与系统重组所生成的地 域网络·····	163
第四节 定型格局时期刻书业中心的几度迁移及其最后确 立·····	165
初步结论·····	180

下篇 地域分化与文化周期

——以信仰形态为核心展开的研究

引子·····	187
---------	-----

第一章 闽越信仰:福建信仰形态的区域底色·····	192
第二章 第一周期(相当于西晋至盛唐):国家宗教与民间信仰平行及交错发展的地域格局·····	198
第一节 福建佛教早期区域化进程·····	198
第二节 福建道教南北两个重心的形成·····	206
第三节 早期民间信仰地域分布的推测·····	211
第三章 第二周期(相当于中唐至两宋):国家宗教主导化及其瓦解的地理过程·····	222
第一节 沿海地区:第一周期发展的典型地域·····	222
一、宗教地域扩展的总体态势及其地理基础·····	222
二、国家宗教主导化进程的地域表象·····	231
三、宗教主导化的内在局限及其瓦解的地理过程·····	241
第二节 闽北地区:第二周期发展的不完整地域·····	253
第三节 闽西地区:第二周期发展的变异地域·····	267
第四章 第三周期(相当于元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区域体系与地域分化的双重进程(上)·····	275
第一节 第三周期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	275
第二节 方志政书所见福建民间信仰祠庙地域分布情况·····	282
第五章 第三周期(相当于元明清时期):民间信仰区域体系与地域分化的双重进程(下)·····	356
第一节 东西分异:沿海信仰的地域体系与内陆的零散分布·····	356
一、沿海与内陆神明信仰分异的地域表现·····	356
二、沿海与内陆神明信仰分异的形成过程·····	364
第二节 南北分化:闽江流域与泉州漳各自的一体化进程·····	381
第三节 地域神明信仰从边缘地带到核心地带的“换位”——以清水祖师等地域神明为案例的分析·····	398
基本结论·····	417

绪 论

一提起闽文化,人们总会想起誉满海内外的妈祖信仰、推进佛教中国化的闽僧、曾支配官方意识形态长达 700 年之久的闽学……闽文化直接影响的地域极为宽泛,它不仅向广东、海南、台湾延伸,甚至扩展到东南亚和东北亚,而且随历史演进还表现出种种独特的地域形态,对当地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闽文化又被视为东亚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支撑。

然而,当人们将视野收缩到福建这个闽文化的发展基地时,却不断发现,福建文化自身的演进交织着一系列充满矛盾的地域表象:

不同地区的福建人深切地感受到彼此之间方言与风俗的严重差异,可他们一旦走出福建,却又呈现出有别于其他省区的共同特征且易于形成文化认同;

“信巫鬼,重淫祀”被认为是福建文化后进的表现,可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福建民间信仰依然长盛不衰,目前平均每 600 人便拥有 1 所大型的宫庙。佛教影响也同样庞大,据前几年的调查,全国 5000 多所汉传佛寺中福建就占有 4000 余所;

福建最先感受到“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的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1〕,正是在这

〔1〕《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51、252 页。

对抗之中新思潮不断推涌,而福建固有的文化及保守的观念,却又拥有着不亚于内地的强大生命力;

.....

的确,福建文化整体上的明显一致与内部区域间的严重分异鲜明对立却又并行不悖,文化发展中保守与开放、落后与先进形成跳跃性反差却又相互依存,这众多繁难的地域表象所展现的独特魅力与课题深度,吸引了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关注,其中福建学者的成绩尤为突出。对这一学术探索历程的回顾,不仅有助于我们确立新的研究基点,更为进一步的考察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照坐标。

一、学术史回顾与课题任务的提出

在北京大学民俗学运动的推动下,运用现代民俗学方法进行田野调查和研究的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23年10月14日北大《歌谣周刊》第28期由温寿链撰写的《福建龙岩县的民俗调查》。1924年陈锡襄从北大返回福州时,将北大风俗、方言等调查会的形式“镕而为一”,“组织一个大规模的‘闽学会’”,并提出“搜求古今闽人有关闽学之著述,并整理之”及“编辑闽学丛书”等全面研究福建文化的宏伟构想,待次年董作宾来榕即初步协商实施,可惜这番努力很快就被“五卅惨案打断了”〔1〕。1926年12月13日,顾

〔1〕 1930年7月6日第17期福州《民俗周刊》为《歌谣专号》(二),江鼎伊在该刊的《写在〈歌谣专号〉之前》一文中曾回忆道:“民国十三年秋,福建协和大学教授陈锡襄回自北京,即想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的计划镕而为一,组织一个大规模的‘闽学会’。这事一直到董作宾教授于民国十四年春来到福州,才协同讨论具体办法”,后被“五卅惨案打断了”。直到1930年春,魏应麒、江鼎伊才组成了“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另外,陈锡襄本人曾撰写《闽学会的经过》一文,所反映的事实与之相近,载于《中山大学语

颉刚、林幽、容肇祖、孙伏园、沈兼士等在厦门大学成立了风俗调查会,这一历史性事件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福建文化研究正式全面展开,厦大也成为当时民俗学运动中心由北大向中大迁移的中转站。同年秋,这批北大教授不堪军阀迫害,纷纷离京,相继受聘于私立厦门大学。到厦大不久,他们便延续北大风俗调查会的方式,开展了以福建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探索^{〔2〕},并创办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载有顾颉刚《泉州的土地神》、林惠祥《闽南的下等宗教》,等等。虽然该刊因国学所的取消而停办,但是,从仅办的3期《周刊》中可以看到他们立足地域、贴近底层看文化的浓厚兴趣,对有关研究的进一步展开也具有规定性的影响。当时提出的不少课题生命力犹在,至今仍为人们所瞩目。与此同时,关于福建文化如何形成等重要问题也得到关注,例如,顾颉刚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就曾提到,唐末五代以来的各种战乱,“福建幸未扰及,当时湖南、江西、浙江故家世族搬去的很多,所以能形成一

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卷第7、8期,1927年12月13日、20日。考虑到当时闽学会仅成立几个星期便夭折了,且参与者很少,实际影响力也相当小,故本书不将它作为福建本土文化研究的历史性开端,但它在构想中所涉及的探讨范围之广是不可忽视的,它所谈的“闽学”与当前人们所讲的以朱熹为代表的福建哲学思想不同,而是试图将福建文化诸多方面的研究作为一个完整的闽学来看待。就此而言,它已初步触及到福建文化地域性的某些内容。

- 〔2〕 1927年1月5日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载有“启事”以征求民俗学的稿件、材料,“现在我们要征求以下各种的材料,无论是片断的传说,或是系统的记载,我们都欢迎,收到后当陆续在本周刊发表,并以该周刊奉赠。(赐件请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编辑部收)一、海神、土地神及洛阳桥等等的传说。二、朱子、郑成功、郑和(三宝公)及倭寇的传说、遗迹,并一切事实的记载。……五、通行于福建全省或一局部之富有地方性的戏剧及其剧本”等等。这一“启事”充分表明了他们的调查是以福建文化为中心内容的。

种文化”〔1〕。这一论断固然有待深入探讨,不过,此时由风俗调查而及文化研究已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1930年秋,以福建师范大学的前身——福建协和大学部分师生为主成立了“福建文化研究会”,同年冬又创办了《福建文化》季刊。该刊物定价“每册大洋五分”,从1930年到1948年,在艰难的条件下竟奇迹般无间断地推出了38期,集中体现了三四十年代福建文化的研究成果,内容涉及福建民俗、学术、经济、地理、生物等诸多方面,其中不少文章至今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是那些实地调查所得的资料尤为宝贵。另外还刊载了一些海外学者的文章,如傅衣凌先生翻译的日本田中荒己的《清初闽粤浙沿海考——以迁界为中心的一个研究》(载于该刊第一卷第三期)等。刊物中的文章几乎不见大而化之的空泛讨论,反映了当时福建文化研究的学术理路。可以说,三四十年代福建对本土文化的研究以北大入闽教授的推动为契机,以注重地域特色的风俗调查为突破口,进而以福建高等学府为主力依托,一个学术传统悄然形成:结合实地调查与地方文献,对福建特定地域范围内的文化现象进行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当时注重福建本土研究的傅衣凌先生在他所从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倡导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等主张,就与这一学术传统不无关系,而充分体现其学术特色的于1944年出版的《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则成为战后日本汉学方法论重建的主要来源。另一位注重本土研究的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就积极主张实地调查,与傅先生具有相近的学术风格。由此看来,1982年中国人类学研究会厦门大学成立就是个意味深长的事件了。诚然,过于拘泥细致的实证研究未必有利于文化进程的整体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体的把握更有利于发掘个别现象的价值,进而推进实证研究的展开。可是背离这一

〔1〕《顾颉刚致胡适之的信》,见《胡适日记》上册,第290页。

传统无疑会使探讨陷入游谈无根的境地。

50年代以后,虽亦有像罗常培先生的《厦门音系》这样优秀的著作问世,但福建的本土研究已盛况不再,三四十年代所形成的学术传统不断淡化,相关的研究则力图满足某种政治观念模式的兴趣。原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57级同学以集体力量编写的《福建文学史》(油印本),其产生的背景不言自明。遗憾的是,福建文化的研究也更为低沉,这不仅由于当时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忽视,更有福建文化自身的原因,因为研究的深入难免要触及对福建具有深刻影响的朱子学、宗教信仰等内容,而这些内容在当时的观念框架中很难被接受。1976年庄为玘先生的《福建历史地理》^{〔1〕}(油印本)和1982年朱维干先生的《福建史稿》作为较全面的福建研究成果,其中有关文化的篇幅都相当之少。实际上,一直到了80年代中期福建文化的研究力度仍然很有限,曾有人针对这一状况十分中肯地说:“与其它区域文化研究相比,闽文化研究显然还较为沉寂,还不是那么热火,也没有形成某种阵势。”^{〔2〕}当时福建地方史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史、民族史、海外关系史、闽越国问题、思想史和某些历史人物。对于像朱子学这种福建文化的重大课题,1980年已有人注意到朱熹对福建文化教育的影响^{〔3〕},但1982年的有关论文还是认为朱子学的政治作用是消极反动的,研究的意义仅在于它是中哲史的一个重要环节^{〔4〕};1986年10月福建人民

〔1〕 从严格意义上讲,庄为玘先生的《福建历史地理》除政区沿革外是不能称为历史地理的,书中篇幅居多的是福建的专题与地区的简史。至于有关情况介绍的粗略,鉴于当时的学术背景,实不可苛责。

〔2〕 何绵山:《闽文化研究纵横谈》,载于《闽文化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 方品光、陈明光:《试论朱熹对福建文化教育的影响》,《福建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4〕 孙明章、高令印:《闽学略论》,《厦门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出版社出版了《福建朱子学》一书,才逐渐形成对朱子学更深入的认识,但对其与文化的关系仍不够关注;直到1995年8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闽学源流》才真正注意到了闽学与福建文化的内在联系。

80年代末期福建本土文化研究迅猛发展之际,恰是全国“文化热”退潮之时,人们对福建文化深切的关注与积极的探讨是由于福建自身的发展及不同领域的学术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深入到福建文化这个无法回避的深层问题。从省级文化机构到各地县的相关单位都积极组织力量推进地方文化的探讨,福州与厦门两个研究重镇迅速形成,接踵而至的学术会议、层出不穷的文化刊物、大量涌现的论文论著,实在令人目不暇接。有人曾粗略统计,仅妈祖研究一项,从1929年顾颉刚、容肇祖发表的文章^[1]算起,到1991年为止约在250篇以上^[2],且集中于80年代后期;而据笔者所知,1990年以后福建民间信仰的有关论文至少有2000篇,精品力作有之,粗制滥造者亦有之。笔者认为,目前的繁荣已远远超出学术的范畴,更多的是政府行为、民间力量及学术参与等共同促成的一种社会现象。相对于那种先作区域文化空泛之论再作具体研究的模式来说,福建本土文化研究的进展确实克服了不少区域文化探讨中将有关现象随意填塞、空头理论建构的弊病。所谓闽文化的宏论也曾出现,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大致地讲,20多年来福建的本土文化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由热点问题引发的探讨,如由临水夫人、妈祖、吴真人等热点发展起来的民间信仰研究,由闽台关系而及闽台文化的探索,由空海等名僧推广及宗教史的考察等;二是学科发展的衍化产物,如地域文学研究分化的福建文

[1] 顾颉刚的《天后》和容肇祖的《天后》,《民俗》1929年第41、42期。

[2] 李玉昆:《近几年来福建民间信仰的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1期。

学史探讨,围绕“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课题的实地调查而生发出家族研究等〔1〕。尽管前者可能会凝固研究的内在机制,后者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学科壁垒,但是,这样一种发展态势却有助于人们对逐个问题的深入探讨并层累地推进研究的开展,福建文化研究也因此整体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平。90年代中期相继出版的“福建文化丛书”和“福建思想文化史丛书”反映了当前研究的总体成就,而《福建思想文化史纲》这部在丛书中带有总结性的论著,明确地表明了对福建文化的总体特征与区域特色的阶段性认识。

应该说,福建文化研究从上世纪20年代风俗现象的初步考察到90年代地域表象的深层开掘,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艰难过程。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所谓海外文化与内地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二元区分过于简单对立,目前流行的种种文化理论或许有助于局部问题的解决,但在总体研究上往往显得乏力。于是,人们更乐于向历史地理这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求援。也正由于研究日趋精细、地域表象相继揭示及区域特色的反复呈现,人们不断发现福建文化自身确实隐含着深刻的特殊性,从不同

〔1〕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中就曾指出:“自1983年以来,为了开展全国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明清福建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我们在福建各地进行了广泛的社会经济史调查,搜集和查阅了大量的族谱、契约、祭产簿、分家文书等家族史资料。我们发现,明清时期福建的家族组织,是最为系统的基层社会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为了全面论述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史,就必须深入分析家族组织的结构和功能。”(第18页)陈支平、李少明合著的《基督教与福建民间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的“前言”中也有类似的记述:“1982年以来,我们经常到福建省城乡各地作社会经济史的调查访问。……那些‘半洋不土’式的教堂依稀地散布在乡村之中,显得格外醒目,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和兴趣,从而开始了我们对于福建基督教的断断续续的社会调查。”

角度展开的研究正日益切近一个共同的主题——福建文化的地域性。

二、文化地域性一般探讨模式的若干问题

关于文化地域性的探讨,目前普遍流行的理论表述是“寻求特定地域范围内文化自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地域文化的特殊规律又是在文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于是,逐渐产生了一种常见的研究模式:将地域文化的发展划分为若干阶段,研讨各个阶段的主要特征,进而剖析其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并以一批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文化现象为阶段性特征的代表,最后在各个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总结出若干基本特色,确信这些特色就是文化的地域性。这种研究模式也相应形成了一定的著述结构:首先概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背景,在描述文化的阶段性特征之后再分述某些典型现象,最后综述地域文化在不同阶段中所反映的共同特色。当然,这一著述结构也有多种变体,如先概述地域文化的若干特色,再逐一详述它们各自的代表性现象及其在时代和地区上的差异,进而探讨有关的形成原因。这也是区域文化史惯常采用的研究模式。

我们无意推敲上述研究模式及相应著述结构的是非得失,不过,它往往令人产生不少困惑。这一研究模式隐在的基本前提是将地域范围内的文化现象都当成可以反映地域特征的表象,倘若这一前提成立,所有福建地区的文化现象都属于福建文化的范畴,那么,福建地区自有人类以来就不曾脱离过文化活动,也就不存在福建文化何时形成的问题。再有,具备时代色彩和全国地位的文化现象反复被强调,并注重那些反映时代新变、富有全国影响事象的研究,这当然未必不合理,但一味偏重它们并以之直接充当某一时期的地域文化的代表就易于捉襟见肘。比如说,元代福建文学的

研究一般都是以杨载的创作为开端,兼具时代色彩和全国地位的杨载经常被认为是当时福建文学的杰出代表,可是这位气象万千的全国性诗人所展现出的明朗雄浑的主体风格与整个元代福建诗风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入。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实际上,那些及时感悟时风之变的所谓全国影响的文化名人有不少是游离于地域文化的进程之外的,尽管人们总是乐于让他们扮成某一时期的地域文化的当然代表。其实,就是那些所谓影响深远的文化名人又有多少是在当时稍纵即逝,待后人发掘才知他的重要性的。学者的知名度历来就难同其学术成就成正比。濂洛关闽并称往往让人们误以为是当时著名的四大地域学派。实际上,周敦颐在世及身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湮没无闻,他的学术价值是经二程、朱熹等不断开掘、反复倡扬才得以名显天下的。客观地说,以往的研究并非没有充分关注阶段性特征在地域内部的分异,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这些相似与差异。朱子学在南宋福建各地区的发展是相当不平衡的,并不像后人想象的当时朱熹思想已笼罩全省,事实上,它昌盛于闽北,发展于闽南,渗透于福州,初涉于闽西。即使是福州、莆田和闽西所受的影响程度同样较小,表面上颇为相似,实际情况却截然不同,前者是由于拥有自身的雄厚文化基础和大量的学术人才,对朱熹思想倾向的接受需要思考、消化而不像学术初兴的漳州学人那样趋之若鹜,而后者则是由于文教水平过于落后,更多的人尚未达到理解朱子思想的基本水平。发达区的闽北作为朱子学的发展基地,其昌盛之因自不待言,而闽南朱子学的迅速发展并不是自身学术力量发达的表现,而是文教发展到一定程度又尚未滋生杰出学者,朱熹主同安、知漳州时便及时填补了这一空间。从学术发展所需要的文教水平而言,闽西与其他地区不具可比性。文化的地域差异既有同一层次上的程度之别,又有不同层次之间的性质之异。曾执教于巴黎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布罗代尔也曾注意到类似的问题,他说:“一个经济世界的中心一定是一个

高于别的地方的地区。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中等生活水平高于欧洲的中等生活水平。高级地区是这样—一个地区:高级地区面临的问题与外围地区或半外围地区所面临的问题不一样。”〔1〕这段有关经济世界体系的评论对我们的文化研究不无启发之处。倘若忽视文化在地域层级上的性质差异,那么,所谓文化的逻辑演变就完全有可能被理解为某种平面式的纵向推进。

尽管人们已注意到区域文化研究不是在全国文化史来不及论述的地方加上若干章节,不是缩小了的文化通史,但上述研究模式似乎仍受到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文化史之一般观念的潜在制约:文化的发展仅仅是一种文化自身逻辑演进的历史过程,在这里,文化的地域差异虽然不曾被忽略,却被认为是历史共性所体现的地域个性,只作为某种论证的补充而已。历史文化地理在庞大的文化史研究领域处于边缘状态,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很遗憾,这种思维偏向不时给研究的深入带来障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被认为是先秦儒家无神论的代表性观点,发展到二程更是过犹不及。反对汉儒神学化倾向、奠定理学基础的二程思想是以无神论为基本特征的,可与之一脉相承的朱熹虽曾一度摆动于有神、无神之间,其晚年思想却具有鲜明的有神论色彩〔2〕。他居然确信自然现象乃鬼神所为〔3〕,蜥蜴参与做冰雹〔4〕,鬼魂真

〔1〕 详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附录:终天之见”,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2〕 朱熹关于神明观念的论述可集中见于《朱子语类》的《天地》、《鬼神》及《释氏》等篇。

〔3〕 “雨风露雷、日月昼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见《朱子语类·鬼神》。

〔4〕 朱熹认为蜥蜴会做冰雹,“看来亦有之。只谓之全是蜥蜴做,则不可耳。自有是上面结体有底,也有是蜥蜴做底”,并举出若干实例。见《朱子语类·天地》。

实可感,不仅论证得一本正经,而且试图将其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可以说,在神明观念的思想进程上两者之间确实出现了逻辑“中断”。哲学史研究往往将它推入神秘主义一途而虚构两者之间的逻辑联系,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但若是对当时福建民间信仰状况有所了解,我们不难剖析朱熹思想的地域性根源;而正视并准确把握这一地域性根源,反而更能揭示理学自身的理论弹性,从更为深刻的理论层面上进行逻辑重建。放开一点讲,宋明理学的地域分化不仅仅是地域学派从不同角度阐发的结果,同时更隐含着对理论发展多种可能性的催化。或许是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一直到中西文化交流中,当西方思潮未触及思想的终极依据时传统文化仍体现出相当强的伸缩性。“离地度”最高的哲学史尚难悬空发展,更遑论其他了。

或许,在文化史一般观念的背后潜在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一理论强大的内在支撑,可是,马克思对“自然的历史过程”的阐述〔1〕本身就包含着人类活动地理进程的基本内容。也许这一重要命题肇端于哲学史及其哲学化的倾向,使人们忽视了它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反倒是当代不少西方地理学家对此表示深切的学术关怀。美国著名地理学家彼得·吉尔德在前几年

〔1〕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方法,最早是由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原本属于哲学史的方法论,“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我们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从它里面的各个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不过我们当然必须善于从历史形态所包含的内容里去认识这些纯粹的概念”(《哲学史讲演录》,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4 页)。文化史论著在研究方法上与这段论述所展现的观念两者之间的联系依稀可见。作为历史学的基本认识方法,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改造,其实际内容已十分丰富。